

“老车评论”系列解读

特朗普2.0与我们的应对（一）

《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报告解读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第一篇

CIFER团队/编著



- 《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报告为何值得关注？
- 报告认为美国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 报告提出哪些政策工具来帮助美国脱困？
- 美国将如何利用汇率政策/特殊工具对付中国？
- 特朗普2.0系列政策背后的整体战略逻辑是什么？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报告说明

本文依托 CIFER AI 模型，系统梳理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报告全文并提炼核心要点。在模型解读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以确保分析准确性和内容可理解性：

- 1. 准确性：**模型分析应忠于原文内容，避免主观引申或误读，并完整地保留原报告的结构与逻辑。
- 2. 可理解性：**模型输出结果应通俗易懂，确保具备中级经济学知识背景的读者（如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能够轻松理解报告内容。

模型分析完成后，我们对输出结果进行了人工校对、审核与修改。

全文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网站](https://cifer.pbcsf.tsinghua.edu.cn/)上线发布。

<https://cifer.pbcsf.tsinghua.edu.cn/>

基本参考文献

- 1. Stephen Miran,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2025.
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 2. 鞠建东，《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各章小结详见附录，报告解读参照相关章节如下：

中美关税争端，第 1、4 章	大国竞争，第 3 章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货币体系，第 6、7 章
大国竞争与危机演变，第 9 章	国际金融竞争，第 11 章	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第 12 章

其他参考文献及附录：篇尾随附

关于“老车评论”项目

老车（ju）是具备鞠建东教授思想的 AI 数字人。“老车评论”APP 依托鞠建东教授数十年研究成果，融合 CIPHER AI 课题组研发训练的 AI 垂类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技术，目前已形成“论文学习-报告解读-时事分析”的立体化内容矩阵，是 AI 赋能经济研究分析的重要尝试。

项目组负责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

项目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缴洪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实习生

李佳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实习生

李元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CIPHER 研究员

徐楚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初级研究专员

杨栗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初级研究专员

关于《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鞠建东编著）运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分析国际经济领域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大国在国际贸易、金融、技术、产业、安全与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全方位的竞争；用通俗的语言、贴切的事例、丰富的数据、深刻的洞察，在现有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大国竞争的理论体系以及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应用、当代大国竞争的缘起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现状与发展。书中提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总结其事实数据，分析其发展路径。【获取链接】<https://3.cn/2e5-BCUA>

关于 CIFER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依托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注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CIFER 以"集聚英才、扎根中国、服务世界；用思想建设新世界"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国和世界最优秀国际经济学者的研究与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产出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全球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心主任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

目录

一．引言	1
二．理论基础	3
三．关税：特朗普的“武器”再出鞘	9
四．货币：“海湖庄园协议”要来了？	16
五．安全工具：特朗普手中的“王牌”	20
六．特朗普政策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	22
七．结语：特朗普的政策逻辑	26
参考文献	29
附录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各章小结	32

一. 引言

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份报告的作者——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他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他不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在曼哈顿研究所和对冲基金哈德逊湾资本公司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 2020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过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并于 2024 年 12 月被正式提名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这份报告很可能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未来的经济政策思路，绝非“纸上谈兵”。

米兰的经济主张，深受“供给学派”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地缘供应学派”。他主张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重视供应链安全，强调国防开支的经济效益。从他的这些主张中，我们可以预见到，他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些大胆的、甚至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份报告“出炉”的大背景。报告开篇指出，过去十年来，美国民众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满意度大幅下降。无论是普通选民还是经济学家，都对支撑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共识产生了动摇。特朗普再次当选以及其所获得的强有力的民意支持，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这种改革的决心，部分源于美国长期面临的严峻问题，即经常账户赤字。整篇报告提出了系统性解决美国问题的“工具箱”。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问题诊断：**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对美国不利，导致美元被过度高估、进而使得制造业衰落、贸易逆差扩大。

2. **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希望重塑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使其更有利于美国，具体目标包括：

- （1）扭转经常账户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 （2）重振美国制造业；
- （3）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4）让其他国家分担美元作为安全储备货币的“成本”。

3. 政策工具：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特朗普政府可以动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1）关税：这是特朗普政府最熟悉的工具，可以用来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产业、并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

（2）汇率政策：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寻求让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或者单方面采取行动。

（3）安全工具：特朗普政府通过将“安全保障”与贸易、金融挂钩，可能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确保汇率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

其主要论点与华尔街和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不同，本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拥有强大的工具来影响贸易条件、货币价值和国际经济关系结构。以下本报告将分别解读米兰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报告中的具体逻辑和政策工具。

二．理论基础

（一）美元的“特里芬难题”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美国民众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不满，根源在于美元的长期高估以及贸易条件的不对称。而美元高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1. 什么是“特里芬难题”？

想象一下，美元就像是全球贸易的“通用货币”。世界各国都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债，因为它们安全、流动性好，可以用来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这种需求并非完全基于美国自身的经济表现或投资回报，而是出于一种“储备”的目的，就像大家习惯用某种货币来交易一样。

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很久以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必须持续地向世界输出美元和美国国债，才能满足全球贸易和储蓄的需求。这就好比美国开了一家“全球银行”，不断地发行“存款凭证”（美国国债）。

为了输出这些“存款凭证”，美国就需要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可以简单理解就是“花”美元的比“赚”美元的多）。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太爱买外国货，而是因为美国必须“花钱”才能让其他国家拿到美元，然后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

2. “特里芬难题”的困境

现在问题来了。当全球经济增长快于美国时，世界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美国就不得不“印”更多的“存款凭证”，导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越来越大。这就像一家银行，为了满足储户的需求，不断地发行存款凭证，但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却越来越难看。

长期下去，美元就会被高估，因为大家都想要美元，但美国自身的出口商品却因为美元太贵而变得缺乏竞争力。这就像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炒得很高，但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却跟不上。那么为什么美国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不继续去搞资本运作？而要去卖制造业产品呢？

3. 美国为什么要发展制造业：国家安全

报告特别强调了国家安全因素。即为什么要复兴美国的制造业？报告认为在没有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时代，美国可能不太在意制造业的衰退。但现在，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是贸易伙伴，也是潜在的“安全威胁”。拥有强大且多样化的制造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4. 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

报告指出，美元的长期高估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打击。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成了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因为国防工业也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报告引用了一些研究，指出 2000 年至 2011 年间，指出由于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冲击”），美国制造业失去了大量工作岗位。而且，这些失业往往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区，导致当地经济雪上加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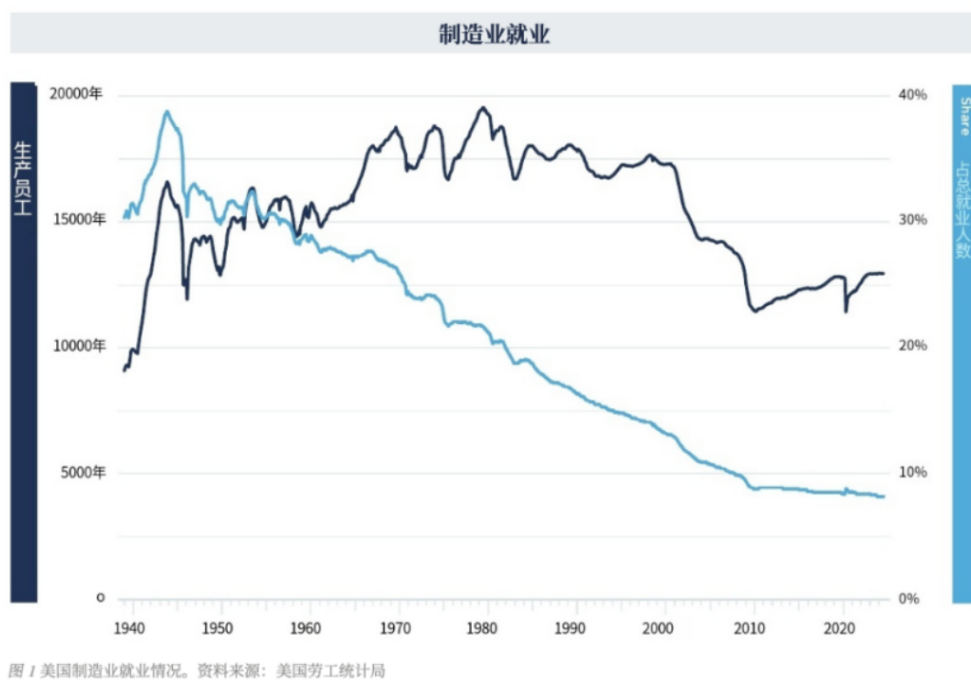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中提供的这张图表（图 1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这张图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变化趋势，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深蓝色曲线）表示从 1940 年代到 1980 年左右，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尽管期间有所波动。但在 1980 年之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显著下降，尤其是在 2000 年之后，下降速度加快。而制

制造业就业占比（浅蓝色曲线）表示这一比例从 1940 年代的近 40%一路下滑，到 2020 年左右已经降至不到 10%。

这张图表有力地支持了报告的观点，即美国制造业出现了长期、持续的衰退。虽然导致制造业衰退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等，但报告强调，美元长期高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5. 为什么美元高估会损害制造业？

可以这样理解：当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过于强势时，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变得更贵，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进口商品变得更便宜，进一步挤压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



图 2 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 2 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

报告中提供的第二张图表（图 2：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展示了这一动态变化。让我们仔细看看，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曲线）从 1960 年到 2010 年左右，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40%左右下降到 20%出头。虽然在 2010 年之后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 1960 年代的水平。

这张图表揭示了“特里芬难题”的一个关键背景，即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尤

其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导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额下降。正是这种背景使得对美元的需求上涨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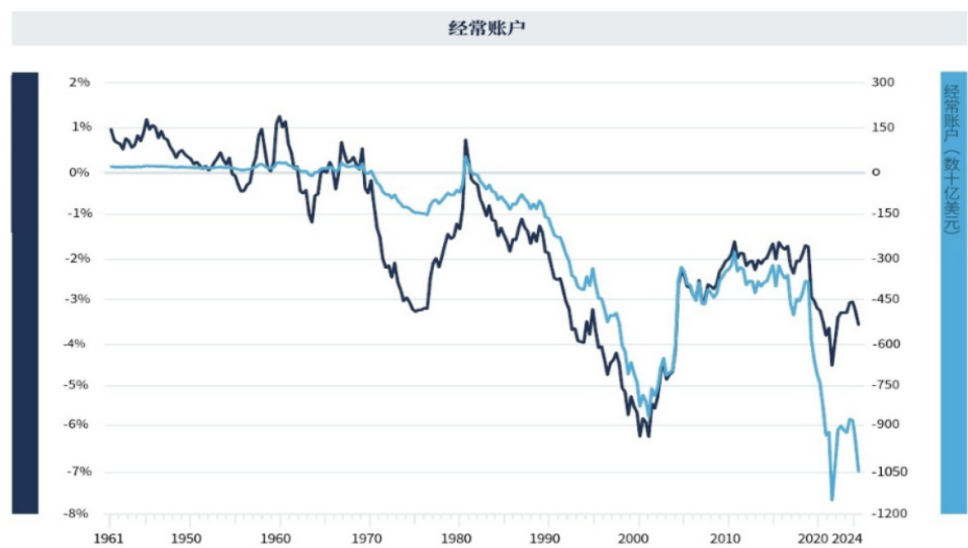


图 3 美国经常账户变化

报告中提供的第三张图表(图 3 美国经常账户)直观地展示了“特里芬难题”的核心表现，其中经常账户占 GDP 的百分比(浅蓝色曲线)，从 1960 年代开始，美国的经常账户开始出现赤字，并且在 1980 年代之后赤字规模不断扩大，2000 年代中期达到峰值(超过 GDP 的 6%)，随后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较大规模的赤字。经常账户余额(深蓝色曲线)，这条曲线以绝对数值显示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规模，与浅蓝色曲线的趋势一致。

这张图表清晰地表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常账户赤字状态。这意味着，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比它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要多。

报告指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过度消费，而是因为美国需要向世界提供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资产)。为了输出这些“储备资产”，美国必须保持经常账户赤字。

至此，报告将图 1，图 2 和图 3 美国衰落的种种表现，都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联系起来了。

(二) 两种“均衡”

至此，报告开始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报告提到了两种关于货币的“均衡”概念：

1. 贸易均衡：在这种观点下，货币汇率应该调整到使国际贸易平衡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它的货币就应该升值，直到贸易恢复平衡。

2. 金融均衡：在这种观点下，货币汇率应该调整到使投资者对持有不同货币的资产感到无差异的水平。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储备货币时，情况就复杂了。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并不完全取决于贸易平衡或投资回报，而是出于储备的目的。这种需求往往是“刚性”的，受经济基本面影响较小。

报告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特里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储备资产是一种全球货币，对它的需求取决于全球贸易和储蓄，而不是储备国的贸易平衡或投资回报，从而不满足上述的两种“均衡”。尤其是当储备国（美国）经济占比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变小时，问题就来了。对储备资产的需求会导致美元大幅高估，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三）“临界点”

理论上，当美国的赤字大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发对美国国债的信用风险，导致美元失去储备地位，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的“临界点”。但报告认为，美国离这个“临界点”还很远，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货币或资产可以替代美元和美国国债。

（四）储备货币的“特权”与“诅咒”

报告进一步总结了储备货币地位的三大影响：

1. 借贷成本更低：由于对美国国债的持续需求，美国可能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款。但报告认为，这个优势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的借款成本都比美国低。

2. 货币更坚挺：更重要的影响是，对美国资产的储备需求推高了美元，导致美元长期高估，损害了美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

3. 金融治外法权：控制储备货币的国家，可以利用金融手段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可以通过制裁等手段，影响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国家安全目标。

（五）核心权衡

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核心权衡是：出口竞争力 VS. 金融影响力。由于金融影响力与美国在全球安全秩序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储备货币地位问题必须与国家安全问题一起考虑。美国为自由民主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并从中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好处，但同时也承担着美元高估的负担。

报告认为，如果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现状，就将采取措施改变它。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单边或多边的方式，以及侧重于关税或货币政策的手段。报告强调，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带来金融市场和经济的风险。但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减轻这些风险，并尽可能使政策调整取得成功。

特朗普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保持金融影响力的同时，加强出口竞争力。报告预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措施，试图在保持美元地位的同时，改善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负担分担机制。报告提到，尽管美元高估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压力，但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强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价值，并威胁要惩罚那些放弃使用美元的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将试图收回一些美国提供储备货币给贸易伙伴带来的好处，并将这种经济负担分担与国防负担分担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第二节深入分析了“特里芬难题”对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并探讨了可能的政策应对。

三．关税：特朗普的“武器”再出鞘

正如报告第三章开篇所言，关税对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来说，绝非陌生的工具。在 2018-2019 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他们就曾广泛使用关税，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取得了“成功”。这里的“成功”指的是，当时的关税措施并没有对宏观经济造成明显冲击，通胀稳定，GDP 增长也保持良好。因此，有理由预期，关税将再次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

（一）关税与汇率：微妙的互动关系

在正式分析之前，让我们温习一下关税的经济学原理，特别注意下汇率调整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简单来说，关税和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跷跷板”效应。当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理论上这些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会上涨。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出口国的货币会相对于美元贬值，那么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可能并不会上涨太多，甚至可能完全不变。

报告用一个简洁的数学公式来说明这个机制：

$$pm = e(1 + \tau) px$$

其中， pm 是美国进口商支付的价格（以美元计）， px 是出口商收取的价格（以出口国货币计）， e 是汇率（美元/出口国货币）， τ 是关税税率。

假设初始时 $e=1, \tau=0$ 。如果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 ($\tau=0.1$)，但同时出口国货币贬值 10% ($e=0.9$)，那么新的 $pm = 0.9 * (1 + 0.1) * px = 0.99px$ 。也就是说，汇率的变动几乎完全抵消了关税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汇率抵消”（Currency Offset）。

（二）“汇率抵消”的四大假设

不过，报告也指出，要实现完美的“汇率抵消”，需要满足四个关键假设：

1. 汇率调整幅度要恰当：出口国货币的贬值幅度必须与关税幅度相匹配。
2. 出口商品主要在本国生产：如果出口商品的大部分附加值是在其他国家产生的，那么出口国货币贬值对最终价格的影响就会减弱。

3. 汇率变动完全传导到出口价格：出口商需要根据汇率变动来调整其本币价格（ px ）。但由于许多进口商品以美元计价，汇率变动可能不会立即影响 px ，而是会影响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4. 进口价格变动完全传导到零售价格：进口商需要将关税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报告承认，这些假设在现实中未必完全成立，因此关税和汇率变动可能会导致价格、贸易流量和市场的波动。

（三）核心权衡：通胀 vs. 贸易再平衡

关税政策也面临一个重要的权衡：一方面，如果汇率完全抵消关税，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不会上涨，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同时，贸易流量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为进口商品相对于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并没有下降。美国政府可以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如果汇率不抵消关税，进口商品价格会上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同时，贸易流量会发生调整，因为进口商品变得更贵，消费者会转向购买国内商品或其他国家的商品，实现贸易再平衡。

（四）重温 2018-2019 关税战：宏观与微观的“分歧”

这时报告回顾了 2018-2019 年中美贸易战的经验。当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关税的影响。报告引用了布朗（Brown, 2023）的研究数据（见图 4）。

2018 - 19 年贸易关税与关税后美国进口价格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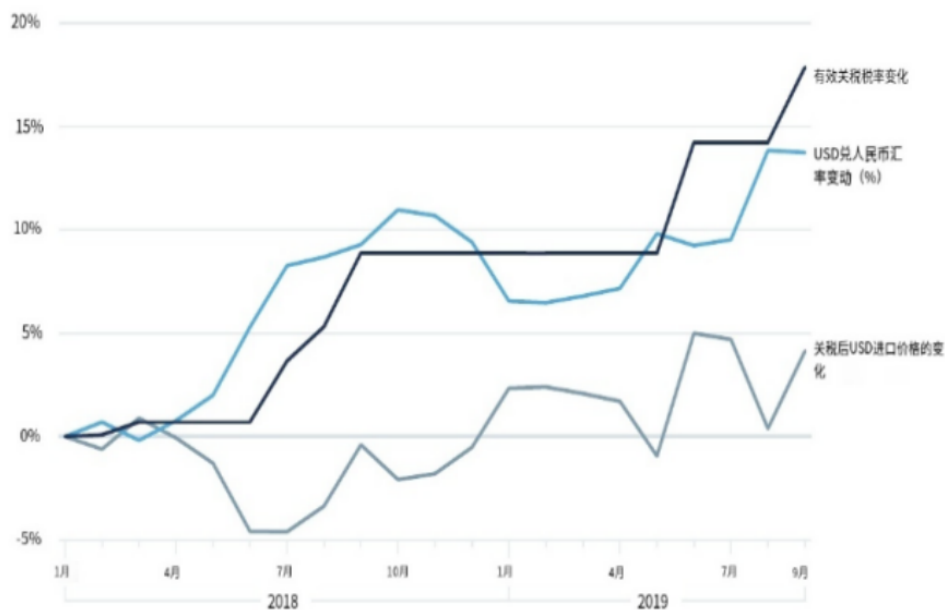


图4 有效关税率的变化及货币抵消情况。资料来源：布朗（2023年），美联储，作者计算所得。

图表 4 有效关税率的变化及货币抵消情况

其中，可以发现，有效关税税率，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上升了约 17.9 个百分点。人民币贬值，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约 13.7%。美元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仅上涨了约 4.1%。

这表明，汇率变动抵消了大部分关税的影响，解释了为什么当时通货膨胀并没有大幅上升。美国当时的 CPI 和 PCE 通胀数据（见图 5）也支持美国当时并没有通货膨胀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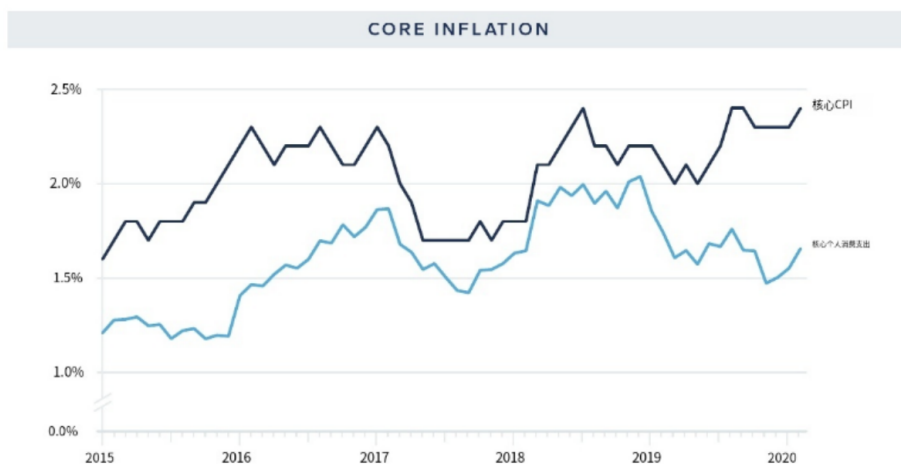


图5 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率，年率。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图表 5 核心 CPI 和 PCE 通胀率

然而，一些研究微观商品数据的学者对“汇率抵消”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Cavallo, Gopinath, Neiman and Jang (2021) 等人的研究发现，关税的成本几乎完全转嫁给了美国进口商，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并没有抵消关税的影响。

报告对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歧”进行了解释：

1. 短期效应 vs. 长期效应：微观数据研究往往关注短期效应，而汇率的传导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因为进口商通常会进行汇率风险对冲。

2. 利润率挤压：一些研究发现，关税导致的是进口商的利润率下降，而不是消费者价格明显上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宏观通胀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3. 转口贸易：为了规避关税，许多中国企业将商品或零部件出口到第三国，进行简单加工后再转口到美国。这可能导致微观数据研究高估了关税对价格的影响，因为那些能够将关税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的商品，更有可能继续被直接出口到美国。

（五）关税负担的分配：谁来买单？

关税的负担分配取决于价格如何调整：

1. 汇率完全抵消：美国消费者不会受到影响，但出口国的实际财富和购买力会下降。出口国“承担”了关税的负担，而美国财政部获得了收入。美国出口商可能会面临一些竞争力挑战，但可以通过国内的去监管化政策来抵消。

2. 汇率不抵消：美国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关税的负担由他们承担。这将促使供应链重构，美国国内生产商将获得竞争优势。总的来说，报告认为，考虑到各种因素，第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通过“汇率抵消”美国关税的可能性更大，而非 Cavallo 所说的传导到了消费者。

（六）关税、汇率与金融市场：潜在的波动

报告指出，虽然“汇率抵消”可以减少消费者价格的波动，但它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更大的波动，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例如，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可能导致股市大幅下跌（见图 6）。类似

地，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引发中国资产价格崩溃和金融压力（见图 7，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



图 6 在 8 月初的闪电崩盘期间，日元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近乎完全。资料来源：彭博社

图表 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美元/日元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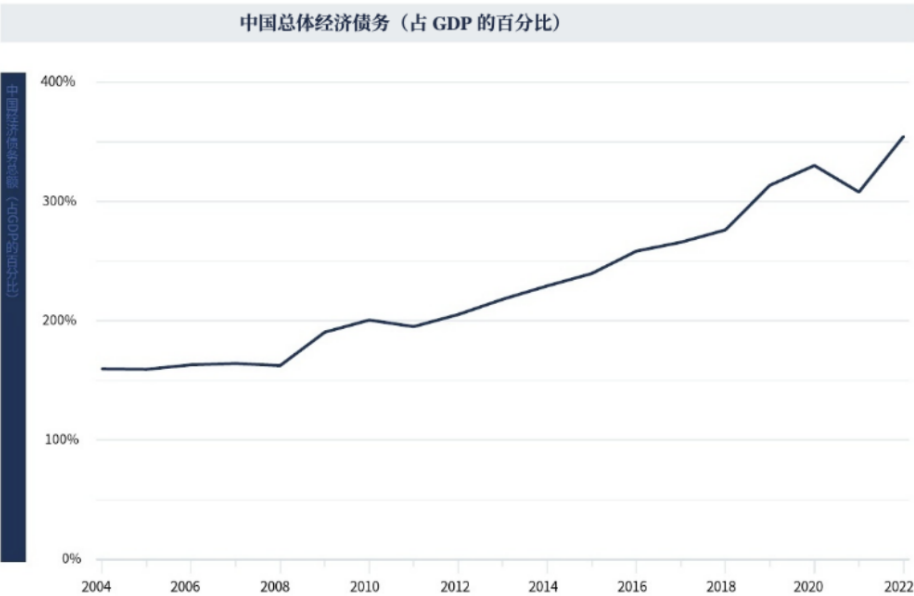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经济中过高的债务水平。资料来源：彭博社

图表 7 中国总体经济债务占 GDP 百分比

（七）“汇率抵消”发生的可能性

报告分析了可能影响“汇率抵消”的其他因素，但最终都予以排除。

1. 利率差异。通常，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异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但在 2018-2019 年，尽管美联储加息，美元仍然升值（见图 8），这表明并不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2. 美国债务问题：有人担心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阻止美元升值。但报告认为，由于关税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担忧可能并不成立。
3. 美元的初始水平：如果美元已经处于历史高位，那么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可能相对有限。
4. 经济增长：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可能影响汇率。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去监管化政策可能会提振经济增长，支持美元。



图 8 美元指数与美国主权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其他七国集团（G7）国家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平均值之差。资料来源：彭博社

图表 8 2 年收益率差与外汇汇率关系

（八）关税的实施：策略与考量

基于报告对 2018-2019 年关税有效性的肯定。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几种降低关税负面影响的方法：

1. 逐步实施。像 2018-2019 年那样，逐步提高关税，而不是一次性大幅提高。

2.明确的规则。公布明确的关税调整计划，减少不确定性。例如，可以宣布每月提高 2% 的关税，直到达到目标水平。这可以让企业有时间进行供应链调整。

3.分级关税。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实施不同的关税税率，根据它们的贸易和安全政策进行调整。

4.将贸易与安全挂钩：将关税与国家安全目标联系起来，例如，对不履行防务义务或支持美国敌人的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

（九）关税与竞争力：“财政贬值”

报告强调，关税可以作为一种“财政贬值”的手段，可以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对进口商品征税，对出口商品减税），可以实现与货币贬值类似的效果。

（十）最优关税：理论与现实

报告还提到了“最优关税”的概念来进一步支持加税的论点。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征收一定水平的关税可以提高整体福利，因为它可以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报告引用了一些研究，认为美国的最优关税率可能在 20%左右，而目前美国的平均关税低于最优关税率。

（十一）防止报复：实力与策略

报告指出，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风险是其他国家的报复。但报告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和资本市场之一，更有能力承受贸易战的冲击。将贸易与安全挂钩，可以防止一些接受美国安全保障的国家报复。

（十二）结论：特朗普的“关税武器”

总而言之，报告的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的经济学原理、潜在影响及实施策略。报告强调了“汇率抵消”的重要性，并认为在汇率抵消的特定条件下，关税可能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财政收入来源和提高竞争力的手段。报告还强调了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包括逐步实施、分级关税、将贸易与安全挂钩等。这些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将关税作为一种“武器”，迫使贸易伙伴做出让步，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体系。

四．货币：“海湖庄园协议”要来了？

我们之前谈到了关税和“汇率抵消”效应，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满足于仅仅依靠关税。这份报告的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还在考虑直接干预汇率市场，让美元贬值。

（一）为什么要让美元贬值？

报告指出，由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导致美元长期被高估，这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此，除了通过关税来“间接”影响汇率，特朗普政府还可能直接出手，让美元贬值。

（二）“汇率战”的风险：动摇美元的根基？

但是，直接干预汇率市场，可不是闹着玩的。报告指出，这样做最大的风险在于，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失去信心。

试想一下，如果外国投资者预期美元会大幅贬值，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岂不是要遭受巨大损失？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抛售美元资产，转而购买其他货币的资产。

如果大量资金流出美国国债市场，可能会推高美国的长期利率，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房地产等依赖长期利率的行业。

此外，美元贬值本身也可能带来通胀压力。报告引用了戈皮纳特(Gopinath, 2015)的研究，认为美元贬值 20% 可能导致 CPI 通胀上升 0.6% 到 1%。

（三）“多边”汇率策略：重返“广场协议”？

历史上，美国曾多次通过与其他国家协调，来干预汇率市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1985 年的“广场协议”，当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联手，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

报告认为，理论上，特朗普政府也可以尝试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洲和中国）达成类似的协议，让欧元和人民币升值，从而实现美元的贬值。

但是，报告也指出，现在的情况与 1980 年代大不相同。欧洲和中国目前都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不太可能同意让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出口竞争力。

日本、英国等国家或许愿意配合，但他们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难以对美元汇率产生足够

大的影响。

因此，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先通过关税施压，迫使贸易伙伴在汇率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再达成某种形式的“汇率协议”。报告戏称这种协议为“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以特朗普的私人庄园命名）。

（四）“海湖庄园协议”：一个大胆的设想

报告还引用了波兹萨尔（Poszar, 2024）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将“汇率协议”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挂钩。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那些享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购买并长期持有美国国债（比如百年期国债），以此来支持美元，并帮助美国降低融资成本。

作为交换，美国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互换额度”，让他们在需要时可以获得美元流动性，从而降低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风险。

报告认为，这种“海湖庄园协议”可以实现多个目标：

1. 让贸易伙伴承担更多“安全保护”的成本。
2. 通过美元贬值，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3. 通过“互换额度”，降低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五）“海湖庄园协议”：可行性几何？

但是，报告也承认，这种“海湖庄园协议”面临诸多挑战：

1. 说服贸易伙伴：如何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这种“捆绑”协议？毕竟，这会让他们的货币升值，并承担更多的利率风险。
2. 美元储备的分布：与 1980 年代不同，现在大部分美元储备都掌握在中东和亚洲国家手中，而不是欧洲国家。而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复杂，更难达成协议。
3. 私人投资者的反应：除了外国政府，还有大量的私人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如果他们预期美元贬值，可能会抛售美元资产，这可能会抵消“海湖庄园协议”的效果。

因此，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先通过关税施压，然后再寻求达成某种形式的“汇率协议”。

（六）“单边”汇率策略：美国能“单干”吗？

华尔街普遍认为，除了与他国合作，美国政府无法单方面让美元贬值。但报告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政府其实有很多工具可以利用，即使不依赖美联储降息。

（七）IEEPA：总统的“尚方宝剑”

报告提到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这项法律赋予美国总统在应对“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威胁”时，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限制或禁止国际资金流动。

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 IEEPA，来打击那些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例如，可以对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征收“使用费”，或者限制他们转移资金，从而使得美国贬值。

当然，这样做也存在风险，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因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从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并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区别对待。

（八）“外国储备积累”：美国也来“囤”外汇？

另一种“单边”策略是，美国政府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积累外汇储备。通过抛售美元、购买其他国家货币，来推高其他货币的汇率，从而实现美元的贬值。

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ESF)可以用于此目的，但规模有限。另一种选择是动用美联储的“系统公开市场账户”(SOMA)，但这需要美联储的配合。

不过，报告也指出，积累外汇储备也存在风险。如果美国政府购买了大量外国资产，而这些资产出现贬值或违约，那么美国纳税人将遭受损失。

此外，如果美联储通过“印钞”来购买外汇，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来“冲销”这种影响，但这又会削弱干预汇率的效果。

（九）总结：特朗普的“汇率战”

总的来说，报告的第四章向我们展示了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汇率战”策略：

1. 目标：让美元贬值，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

2. 手段：

（1）多边：寻求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汇率协议”（“海湖庄园协议”）。

（2）单边：利用 IEEPA 打击美元储备积累，或直接干预汇率市场。

3. 风险：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通货膨胀，甚至损害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特朗普政府能否成功打赢这场“汇率战”，还有待观察。但这份报告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这场“战争”背后的复杂博弈和潜在风险。

五．安全工具：特朗普手中的“王牌”

在解读这份报告时，我们已经了解到，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对美国不公平，导致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可能动用多种政策工具，包括关税、汇率政策，以及我们现在要重点讨论的——“安全”工具。

报告中虽然没有单独开辟一个章节来详细阐述“安全”工具，但“安全”的概念贯穿始终，尤其是在讨论“多边汇率协议”（“海湖庄园协议”）和“分级关税”时，都明显地体现了“安全”与贸易、金融的深度捆绑。

（一）“安全”工具的核心：以安全换让步

“安全”工具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将自身提供的“安全保护伞”（defense umbrella）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挂钩，把“安全”作为一种“筹码”，换取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具体来说，就是将“提供安全保障”与“要求贸易伙伴让步”这两件事捆绑在一起。如果其他国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在贸易和金融问题上做出让步，其中包括：

1. 同意让本国货币升值，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 购买并长期持有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元，并帮助美国降低融资成本。
3. 在美国进行投资，创造就业机会。

（二）“胡萝卜加大棒”：安全保证的分级

报告中多次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根据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现，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也将是“分级”的：

1. “盟友”： 那些在贸易和安全方面将与特朗普密切合作的国家，将继续享受美国提供的全面安全保障，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获得更优惠的待遇。
2. “中立”国家： 那些在贸易和安全方面与特朗普保持一定距离的国家，不遵从特朗普政策的，需要在美国的安全保障和自身利益之间做出权衡。
3. “对手”： 那些在贸易和安全方面完全不遵从特朗普政策的国家，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甚至将被排除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外。

（三）“不合作”的后果：失去安全保障

如果其他国家不愿在贸易和金融问题上与美国合作，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失去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报告中暗示，美国可能会减少对某些国家的安全承诺，甚至将它们排除在“安全保护伞”之外。这对于那些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四）“安全”工具的潜在影响

将“安全”与贸易、金融挂钩，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一些国家可能会被迫加强自身国防建设，或者寻求与其他大国建立安全联盟，这将导致全球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2. 地区冲突风险上升：如果美国减少对某些地区的安全承诺，可能会引发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失衡，导致地区冲突的风险上升。

3.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安全”工具的使用，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五）总结：特朗普的“安全牌”

“安全”工具是特朗普政府手中的一张“王牌”。通过将“安全保障”与贸易、金融挂钩，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但这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也与作者米兰的“地缘供应学派”主张相呼应，即将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纳入经济政策的考量之中。

六．特朗普政策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

报告的第五章开宗明义，指出特朗普如果在 2024 年再次当选，很可能会比第一任期更加地推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变革。由于无法再次连任，他将更专注于自己的“政治遗产”，力求实现其核心目标：重振美国制造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报告回顾了前几章提出的各种政策工具，包括关税、汇率政策和“安全”工具。

（一）“市场稳定”：特朗普的“软肋”？

尽管特朗普可能采取大胆的政策，但报告认为，他也会顾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毕竟，特朗普一直将股市表现视为自己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预计特朗普政府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冲击。

（二）“先关税，后汇率”：特朗普的策略？

报告分析认为，相比于直接干预汇率，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先使用关税。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关税更“顺手”： 特朗普对关税很熟悉，而且在第一任期内，关税政策成功地为美国带来了财政收入。
2. 汇率政策风险更大： 改变美元政策是一项全新的尝试，特朗普的一些顾问也曾警告过其中的风险。
3. 关税可以作为“谈判筹码”： 通过先征收关税，可以迫使贸易伙伴在汇率问题上做出让步。
4. “先扬后抑”： 预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先对美元有利（通过关税），然后以关税为筹码，再转向通过汇率调整美元定价和储备情况。

（三）“投资换市场”：另一种“海湖庄园协议”？

报告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利用关税作为筹码，换取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机会。

这类似于里根政府时期解决贸易冲突的做法。特朗普在 2024 年 7 月的一次讲话中也表示，

欢迎中国在美国建厂。

但报告也指出，这种做法存在一些问题：

1. 可能“不守信用”：中国在遵守贸易协议方面可能会“有所变化”，美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中国履行承诺。

2. 中国“不情愿”：中国可能不愿意将产业转移到美国，这需要漫长的谈判和巨大的压力。

因此，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仍然会先征收关税，以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

（四）“供给侧改革”：降低通胀的“良方”？

报告还强调，为了降低通胀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优先推行“供给侧改革”，包括：

1. 放松监管：减少对企业的束缚，激发经济活力。

2. 降低能源价格：增加能源供应，降低生产成本。

报告认为，这些措施可以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为“关税+汇率”政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五）“分级关税”：奖优罚劣

报告还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根据其他国家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现，实施“分级关税”制度。那些愿意与美国合作、分担责任的国家，将享受更低的关税；反之，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

（六）“多边汇率协议”：前景难料

报告再次提到了“多边汇率协议”（即“海湖庄园协议”），即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协调，让美元贬值。但报告也承认，要达成这样的协议非常困难，既要主要国家货币升值，又要说服其他国家长期持有美国国债。

（七）“单边汇率行动”：风险与选择

如果无法达成“多边协议”，特朗普政府也可能采取“单边行动”，例如：

1. 美联储“印钞”：通过购买外国资产，增加美元供应，从而让美元贬值。但这可能导致

通货膨胀，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来“冲销”这种影响。

2. “外汇平准基金”： 利用美国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干预汇率市场，但这只基金的规模有限。

3. 对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征收“使用费”： 这会导致短期内美元迅速贬值，但可能会引发争议，甚至被视为“违约”。

报告指出，这些“单边行动”都存在较大的风险，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并密切关注市场反应。

如果市场反应过于激烈，特朗普政府还有一些“备用”手段：

1. “积极的财政部发债”： 通过调整国债的发行结构，来稳定市场。

2. “外汇稳定基金”： 利用这只基金来干预市场。

3. “平行政策”： 通过放松监管、降低能源价格、削减财政赤字等措施，来提振经济，稳定市场信心。

（八）“以安全换让步”： 全球安全格局动荡

1. 全球安全格局重塑： 一些国家可能会被迫加强自身国防建设，或者寻求与其他大国建立新的安全联盟，这将导致全球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2. 地区冲突风险上升： 如果美国减少对某些地区的安全承诺，可能会引发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失衡，导致地区冲突的风险上升。

3.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安全”工具的使用，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九）“无论如何”： 共同的后果

报告最后指出，无论特朗普政府采取何种策略，都可能带来一些共同的后果：

1. “贸易伙伴”分化： 那些愿意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将获得更优惠的贸易和经济待遇；反之，则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2. “安全风险”上升：如果美国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可能会刺激一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导致地区冲突。
3. “汇率波动”加剧：重大政策调整可能导致汇率市场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4. “避险需求”上升：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寻求黄金、加密货币等“避险资产”。

七．结语：特朗普的政策逻辑

现在让我们把整个报告的内容串联起来，梳理一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

（一）问题诊断：美国面临“特里芬难题”

1. 美元长期被高估
2. 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3. 制造业衰落

（二）目标设定：重振美国制造业

1. 提高国际竞争力
2. 减少贸易逆差
3. 保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或至少让其他国家分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成本”）

（三）工具选择

1. 关税

（1）作为“谈判筹码”

（2）增加财政收入

（3）“间接”影响汇率

（4）以关税为条件，换取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制造业投资

2. 汇率政策

（1）多边：寻求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汇率协议”，促使美元贬值。

（2）单边：利用法律授权（如 IEEPA），打击美元储备积累，或直接干预汇率市场。

3. 安全工具

（1）以安全换让步，特朗普政府通过将“提供安全保障”与“要求贸易伙伴让步”捆绑在一

起，换取其贸易伙伴在本币升值，支持美元和在美投资问题上做出让步。

（2）分级安全保证，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根据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现，采取不同的政策。

（四）策略考量

1. “先关税，后汇率”：先通过关税施压，再寻求汇率调整。
2. “循序渐进”：逐步推行政策，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冲击。
3. “区别对待”：根据不同国家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表现，采取差异化的政策。
4. “多管齐下”：结合使用关税、汇率、财政、监管等多种政策工具。

（五）风险应对

1. “协调合作”：争取贸易伙伴和美联储的配合。
2. “备用手段”：准备好应对市场波动的“应急预案”。
3. “开源节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财政支出来稳定市场。

（六）潜在后果

1. 贸易关系重塑：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将受益，反之则受损。
2. 安全格局变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可能收缩，地区冲突风险可能上升。
3. 金融市场波动：汇率、利率等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4. 避险需求上升：投资者可能转向黄金、加密货币等“避险资产”。

报告再次强调，由于特朗普对关税“情有独钟”，而且关税已被证明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谈判筹码”，并带来财政收入，因此，很可能先使用关税，然后再动用汇率工具，最后考虑安全工具。

这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调整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中，美元可能会先走强（因为关税），然后再走弱（如果采取汇率干预措施的话）。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政策调整的顺序。

报告最后指出，特朗普政府确实有可能重塑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使其更有利于美国。但这将是一条“狭窄的道路”，需要精心策划、精准执行，并采取措施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鞠建东,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2. Autor, David, 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on.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16.
3. Autor, David, 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on. "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hina shock."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21.
4. Amiti, Mary, Mathieu Gomez, Sang Hoon Kong, David Weinstein. "Trade protection, stock-market returns, and welfare."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8758, 2021.
5. Amiti, Mary, Stephen J. Redding, and David E. Weinstein.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2019.
6. Bessent, Scott. "The fallacy of Bidenomics: a return to central planning." interview and essay at a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2024.
7. Bordo, Michael D and Robert N McCauley. "Triffin: dilemma or myth?" *BIS Working Paper* No. 684. 2017.
8. Broda, Christian, Nuno Limao and David E. Weinstein. "Optimal tariffs and market power: the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 2008.
9. Briggs, Joseph. "Foreign spillovers and Fed policy in a time of global monetary policy tightening." *Goldman Sachs U.S. Economics Analyst*, 9 October 2022.
10. Brown, Chad.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s: an up-to-date char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arts*. 2023.
11. Cavallo, Alberto, Gita Gopinath, Brent Meiman and Jenny Tang.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3(1), 2021.
12. Cipriani, Marco, Linda S. Goldberg and Gabriele La Spada. "Financial sanctions, SWIFT,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 1047. 2023.

13. Chodorow-Reich, Gabriel, Matthew Smith,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Tax policy and invest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No. 32180, 2024.
14. Costinot, Arnaud and Andres Rodriguez-Clare. "Trade theory with numbers: quantifying the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4, Elsevier, 2014.
15. Du, Wenxin, Joanne Im, and Jesse Schreger. "The U.S. Treasury prem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2, 2018
16. Jeanne, Olivier and Jeongwon Son John. "To what extent are tariffs offset by exchange r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42. 2024.
17. Fajgelbaum, Pablo D, Pinelopi K Goldberg, Patrick J Kennedy and Amit K Khandelwal.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1), 2020.
18. Farhi, Emmanuel, Gita Gopinath, and Oleg Itskhoki. "Fiscal devalu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2), 2014
19. Feldstein, Martin and Paul Volcker. "An int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2013.
20. Freeman, Rebecca, Richard Baldwin, and Angelos Theodorakopoulo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shocks, links and hidden exposure." Bank of England Underground, 29 November 2023.
21. Goldbeck, Dan. "Week in regulation: a trillion-dollar year." American Action Forum research.2024.
22. Gopinath, Gita.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646. 2015.
23. Iyoha, Ebehi, Edmund Malesky, Jaya Wen, Sung-Ju Wu, and Bo Feng. "Exports in Disguise?: Trade rerouting dur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4-072, 2024.
24. Laforde, Jean-Philippe. "Overview of changes to the FRB/US model." FEDS Notes, 2018.
25. Laperriere, Andy, Don Schneider and Melissa Turner. "Acting alone: presidency relatively more important in this election." Piper Sandler US Policy Macro Research. October 24, 2024.

26. Levin, Andrew T. and Christina Parajon Skinner. "Central bank oversight: assessing the Fed's accountability to Congress." Hoover Institution Economic Working Papers Number 21320, 2024.
2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 exorbitant privilege? Implications of reserve currencies for competitiveness." Discussion paper, December 2009.
28. Miran, Stephen and Nouriel Roubini. "ATl: Activist Treasury Issuance and the tug-of-war over monetary policy." Hudson Bay Capital Research Series, 2024.
29. Mohsin, Saleha. "Paper soldiers: how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dollar changed the world order." Portfolio, 2024.
30. Poszar, Zoltan. "Money and World Order." *Ex Uno Plures* 2(8), 2024.
31. Saez, Emmanuel, Joel Slemrod, and Seth H. Giertz. "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marginal tax rate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1), 2013.
32. Zhou, Xiaochua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eople's Bank of China, 2009.

附录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各章小结

第一章 国际争端为什么会发生？

本章首先介绍了全书的主题：理性、共存，用理性的方法分析大国的竞争共存之道。理性分析要突破当代经济学的约束条件下最优化的分析框架，而大国共存则需超越数千年来霸权更迭的世界秩序传统思维。

国际贸易争端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国家之间存在整体、长期与局部、短期的利益冲突。本章建立的国际贸易争端三大原理，提供了国家之间整体、长期利益冲突的分析框架。

第一个原理是比较优势原理，这也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最基本的原理，阐述了各个国家如何按照机会成本来确定国际分工，提高跨国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个原理是跨国垄断利润原理：国际贸易活动中，一个国家或其企业利用其在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取跨国垄断利润，对跨国垄断利润的争夺会引发国家之间整体利益的冲突。当代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规则垄断和军事垄断这四个方面来实现。

第三个原理是分工固化的增长陷阱原理：即使在理想的自由贸易状态下，如果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自由贸易会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原理”，使得穷国与富国的资本报酬趋于一致；使得穷国固化在劳动密集型的国际生产分工中，失去产品升级、从农业化向工业化、从加工到创新的结构转变的动力；掉入低增长的陷阱，形成穷国恒穷、富国恒富的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穷国要打破分工固化的增长陷阱，会引发与富国在长期利益上的冲突。

第一个原理解释如何通过国际分工将全球产出之饼做大，而第二与第三个原理解释在划分全球产出之饼上的国家利益冲突。

第二章 经济总量如何增长？

经济总量(GDP)的长期增长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也代表了它的长期、总体的利益。

当代经济学关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外生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外生增长理论发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外生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宏观层面研究经济增长的现象，但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缺乏对经济增长微观与宏观机制的分析。

本章提出经济增长的微观与中观机制。在微观机制上，我们提出“双轮驱动模型”，强调技术创新和市场规模的良性循环；在中观机制上，我们提出“增长定理”，即一个经济体保持长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

按照经济活动的四个步骤，创新、生产、交换（贸易）、消费（市场），本章将全球化分为全球发现时代（1500 年-1819 年）、全球贸易时代（1820 年-1978 年）、全球生产时代（1979 年-2018 年）和全球创新时代（2019 年-）。我们发现，全球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伴随着全球垄断形态的演变：在全球发现时代，产品市场的全球垄断得以解放，转化为在贸易段的垄断；在全球贸易时代，贸易的全球垄断得以解放，转化为生产的垄断；在全球生产时代，生产的全球垄断的得以解放，转化为创新的垄断；而在当今的全球创新时代，创新的全球垄断又会向何种形态转变？

第三章 大国如何竞争

通过分析大国竞争的普遍规律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竞争特点，本章建立了大国竞争的 6 领域-3 要素-5 阶段的分析框架：即大国竞争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等 6 个核心领域展开，两国关系由相对实力、政治和文化认同度、第三方效应等 3 个要素决定，以及据此提出的中美两国关系的对抗（1949-1978）、小国-大国（1979-2016）、大国竞争 I（2017-2035）、大国竞争 II（2035-2060）和竞争共存（2060-）等 5 个阶段。

当崛起国的制造业总量赶上守成国、经济总量达到守成国的 60%，两国进入大国竞争阶段。中美两国于 2016 年进入大国竞争阶段，当前处于大国竞争阶段 I。在大国竞争阶段 I，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 2035 年前后在经济总量追上美国；在大国竞争阶段 II，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 2060 年前后在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等 4 个领域赶上美国。

第四章 解析关税争端

本章首先介绍三大定理，首先是国家之间局部利益冲突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增加这个国家丰裕要素的收益，但降低这个国家稀缺要素的收益，在短期增加出口部门的收益，但降低进口部门的收益。

然后是短期利益冲突的最优关税定理与技术竞争的希克斯定理：即当关税政策或技术政策相对增加这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时，这样的关税政策或技术政策有可能改善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至此，与第一章的三大原理一道，我们建立了贸易争端的长期、整体、局部、短期利益冲突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解析中美贸易争端。

2018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调查报告”，提出市场准入，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等四个表面原因。深入分析中美关税争端对两国贸易平衡、社会福利与贸易结构的影响，我们发现中美争端更加本质的原因在于两国在长期、整体、局部、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第五章 镜像策略：如何避免对抗

本章讨论大国竞争的战术。毛泽东在如何避免国共冲突、一致团结对外方面提出过16字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方面，毛泽东也总结了8字原则，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称之为“镜像策略”，因为我方的策略看起来就像对方策略的镜像。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我们证明了“镜像策略”是避免对抗、实现合作的纳什均衡。

以中欧光伏和葡萄酒关税争端为例，我们分析了镜像策略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对抗。接下来我们分析美国对跨国公司的长臂管辖，因为涉及到长期、整体利益的冲突，中美争端不仅需要在战术层面选取最优策略，更重要的是战略方向的制定与实力的竞争。

第六章 三足鼎立：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全球基本矛盾，即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大国竞争的战略。本章讨论全球经济基础，即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通过分析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网络结构，我们发现它在 2000 年呈现出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两极格局，而在 2019 年它转变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转变标志着全球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

进一步分析核心国家在各自区域的地位，可以发现北美价值链、亚洲价值链形成大国/小国的“轮轴-辐条”模式，而欧洲则呈现出“多国合作”的模式。

第七章 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矛盾

全球上层建筑的第一个内容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至今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

尽管全球经济基础已经由美国主导转变为美、亚、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主导。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收取“国际铸币税”，即通过发行货币获得收益，同时将通货膨胀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也可以将美元武器化，作为制裁、打击其他国家的工具。因此，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与单级货币体系之间的不匹配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矛盾。

这个矛盾使得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解决基本矛盾可能有“趋同论”，“去中国化”，以及“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三种思路。建立一个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与全球经济基础格局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第八章 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全球上层建筑的第二个内容是全球治理体系。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经历了苏联解体之后，演变为美国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结构，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不匹配是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源于各国国家主权与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冲突、各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及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当全球化进入到全球创新阶段的当代，霸权更迭的旧的世界秩序范式已经结束，而竞争共存是新世界秩序的方向。将世界失序归因为中美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是严重的误导，世界失序是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表现。

全球治理体系可以有全球与区域双层。多边的归多边，区域的归区域，建立三足鼎立的双层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第九章 什么决定大国竞争的未来

大国竞争的赢者获得更高的经济总量增长率，而输者的经济总量则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据此，我们建立了大国竞争的“增长-危机”分析框架。

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增长具有多重均衡。如果一国的经济总量达到潜在增长率、实现最优增长，我们将其最优增长路径定义为正常增长均衡；我们将不能实现其最优增长路径的其他路径定义为危机增长均衡。当一国发生危机时，其经济陷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从现在到 2060 年，中美竞争有 4 种可能的未来（均衡）。第一，A 均衡，中美皆实现其潜在增长率，我们称之为双赢的均衡。第二，B 均衡，美国实现其潜在增长率，而中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第三，C 均衡，中国实现其潜在增长率，而美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D 均衡，中美两国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大国竞争是外因，而竞争的结果则取决于哪个国家能够避免危机，实现其潜在增长率。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可能面临日本式危机、苏联式危机、公共政策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区域安全危机等 6 种危机。中国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体制改革，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作为守成国的美国可能面临公共政策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宪政危机和区域

安全危机等 6 种危机。

分析当代大国竞争的危机演变路径，我们发现：第一，中国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健康增长；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与美元分担战争风险；第三，中美形成区域对称的军事实力，是中美实现国际秩序基本和平转换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十章 技术竞争

技术创新通常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渐变型技术创新，另一种是突变型技术创新。所谓渐变型技术创新，是指通过对旧科技的更新迭代逐渐积累实现的技术进步；而突变型技术创新是一种颠覆性、破坏性的技术变革，新的技术与旧的技术没有传承关系，采用新的技术意味着放弃旧的技术。前者如芯片技术从 28 纳米、14 纳米，10 纳米一步步发展迭代到 7 纳米、5 纳米、3 纳米；后者如电力技术对于机械技术、数码照相技术对于胶卷技术、新能源汽车的电动机对于汽油车的发动机的替代。

渐变型技术竞争是技术的积累，其规律可以总结为“研发投入竞赛”，在竞争中追赶者常常处于下风，容易落入“追赶者陷阱”。突变型技术竞争是新旧技术的选择，领先者在旧技术上越是领先，选择新技术的机会成本越高；追赶者因为在旧技术的落后，反而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具有比较优势，往往后来者居上，而领先者则容易落入“领先者困境”。

当代技术竞争两大领域，人工智能与非化石能源，前者具有渐变型技术创新的特征，而后者具有突变型技术创新的特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暂时领先，但在非化石能源领域可能落入“领先者困境”；中国在非化石能源领域暂时领先，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落入“追赶者陷阱”。

打破“追赶者陷阱”的关键，是在本国暂时落后的技术上形成“创新-市场”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必须通过国家政策的干预。成功的政策有三个原则：第一，保证本国暂时落后的技术具有一定份额的市场需求；第二，在技术的供给侧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三，技术市场是开放的，能够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步伐。

渐变型技术与突变型技术的竞争规律的区别同样适用到大国在国际金融、全球治理、与军事等其他领域的竞争。

第十一章 国际金融竞争

美国在当代国际金融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创造国际金融领域的突变型技术创新是中国赢得国际金融竞争的关键。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优势地位，第一，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征收美元国际铸币税，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高科技研发、关键产业，从而补强美国实体经济、重构全球价值链；第二，利用美元进行金融制裁，制造中国金融危机与金融封锁双风险。因此，防范金融危机与金融封锁双风险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竞争的主要任务。

本章提出货币政策与货币技术两个方向的突变型创新。第一，构造“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也就是资本流动防火墙，形成第四个国际金融政策工具。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既保证了正常情形下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又对于异常情形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法进行有效抑制，在危机情形下对国际与国内金融市场有效隔离，从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第二，构造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平台。当前跨境支付体系的优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覆盖面广，具有强大的网络外部性，第二是安全、风险低；其痛点也主要有两个：一是交易从发起到结算的周期长，二是交易成本过高。新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平台需要克服两个难点：第一，确定适当的汇率，使得平台内部不能循环套利、平台与外部市场之间也不能套利；第二，其交易成本比现有跨境支付体系要低。一旦克服这两个难点，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将出现。

第十二章 全球治理体系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具有四大原则，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与透明原则，当今这四大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挑战，世界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在中美的全球治理体系竞争中，美国采取了“投资、结盟、竞争”的方针，即投资自己、联合盟友、与中国竞争，其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在全球价值链上“去中国化”，改变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产业“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使中国边缘化”。第二，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与

产业升级，保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全球霸权地位。

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策略，中国最优的博弈策略是“有限反击”：建立“亚洲共同体”，在“亚洲”区域重建 WTO 规则。

“亚洲共同体”的目标短期以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自由化为目标，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技术垄断联盟。中期致力于强化亚洲经济共同体，逐步实现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长期建立类似于欧盟、具有亚洲特色的亚洲治理体系，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三足鼎立”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原则是“以市场换规则”，以中国市场的单边开放换取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 WTO 规则。其建设路径是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先易后难，有序进入。

美国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领域的突变型创新同样是赢得竞争的关键，而“亚洲共同体”的构造就是这种突变型创新，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超越传统的囿于地理范围的秩序建设，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专注于相互依赖经济体的共同市场秩序的构建；第二，超越传统的军事手段，通过对共同体成员进入与退出的动态管理，构建各成员激励相容的“亚洲”秩序；第三，超越传统的争霸思维，三分天下只主导其一，构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

第十三章 创新世界

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本章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创新世界给出规范、系统的初步描述。

创新源于“想法(idea)”，创新的过程可以总结为“想法→创新→技术进步→市场实现”。相应的，人类的创新活动从抽象至具体、由直接到间接分为四个阶段：产生想法、转化知识、提高生产率、实现价值。

创新过程包括两个循环，第一个是创新者与想法云的循环，第二个是创新者与研发机构、市场的循环。在第一个循环中，创新者从想法云中随机抽取想法，而创新者大脑产生的新想法也反馈给想法云，成为想法云的一部分。在第二个循环中，当创新者获得一定质量的新想法之

后，结合劳动、资本和其他中间投入从事研发活动、进行创新，生产出新的技术。新想法的质量越高，创造出来的新技术就越好。新的技术在市场上实现利润，转成研发投入，继续下一阶段的创新。

人类诞生以来，所有人的所有想法的加总集合，构成了想法云的一部分。本章将想法云的特征总结成五个假设：想法的质量服从帕累托分布、想法的质量分布是区域化的、想法的质量分布具有历史相关性、想法具有公共品属性、想法的演化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

创新世界有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集中创新，还是分散创新？第二，创新成果是公有还是私有？第三，是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一个好的创新体制，是这三对矛盾的平衡，而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

想法的垄断是创新世界的核心问题。对想法的垄断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市场垄断，第二是政府垄断。限制对想法的市场垄断，需要政府的力量来平衡市场垄断；而限制政府对想法的垄断，需要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市场竞争来平衡政府的垄断。

保证“想法云”面前人人平等是新世界的核心挑战，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为应对这个核心挑战提供了一个基础。

第十四章 十年战略（2024-2034）

本章总结全书，并提出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的大国竞争战略。

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的大国竞争战略目标就是 CDP 年增长率达到 5%，从而使名义 GDP 总量在 2035 年左右赶上美国。

中国实现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可以总结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

不称王：第一是指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因为不可行、没好处、不应该！第二是指不与美国共治世界。所谓中美共治的实质就是不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只是作为美国实力的补充，帮助美国管理世界。“中美共治”的观点似是而非，其核心问题是看不到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与中美利益冲突的结构转变。在大国竞争阶段，“中美共治”的结果就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被遏制，落入追赶者陷阱，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稳市场：在 20 亿到 25 亿人口的“亚洲”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秩序，我们称之为“稳市场”。稳市场包括建立“亚洲”秩序、稳技术市场、稳资本市场。建设“亚洲”秩序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主导制定亚洲共同体的规则与治理体系。第二，保持“亚洲”市场的稳定与繁荣。第三，维护成员经济体的动态进入和退出。稳技术市场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建立亚洲技术市场的“研发→创新→市场→利润”良性循环；第二，保护亚洲技术市场的竞争。这两方面要求的核心都是反垄断，尤其是反国际技术垄断。对于国际技术垄断，无论采取什么政策措施，本质上，都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而本土技术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在复杂多变、危机四伏的国际金融市场，稳资本市场就是通过主动制定新的资本市场规则来规避风险、稳定市场。

谋共享：关键在于想法、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共享。人类的创新本质上是集体行为。新世界的创新有四个本质要求：第一，由全人类共同参与；第二，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第三，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第四，人性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升华。我们寄希望于中国为新世界带来一个共创、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升华的创新体系。

【获取链接】<https://3.cn/2e5-BCUA>